〔文章编号〕 1002－2031(2016)07－0087－08　　〔DOI〕 10.13239/j.bjsshkxy.cswt.160713

中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

——以中国4011个城镇家庭为例

李　志　李雪峰

〔摘　要〕 利用对全国4011个城镇家庭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居民的不同收入来源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其文化消费，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最大；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工资性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满意度正向调节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负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分别与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作用，揭示出不同收入来源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 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126.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而以不同方式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1]。国际经验表明，文化消费与人均GDP密切相关，当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会快速增长。然而，这一论断与我国的实践却并不相符。自2009年以来，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但文化消费不仅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实际消费与潜在需求之间甚至存在数万亿元的巨大缺口[2]。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文化消费低迷的局面？按照需求层次理论的观点，精神文化的满足属于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良好的物质经济基础是文化消费的前提。有研究表明，文化消费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3]；收入、教育、职业等是文化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4]；改善收入分配往往被认为是扩大消费的最主要手段[5]。一些研究也证实了文化消费和收入之间呈现正相关[6-7]。然而，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但文化消费却不景气的事实，表明收入对文化消费并非简单的正向影响关系[8]。有研究认为，由于文化消费层次不同，收入因素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9-10]，二者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11]。这些发现预示着收入对文化消费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

消费行为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12]。从这一逻辑出发，本研究关于文化消费的解释变量在单一的收入因素基础上增加了消费心理和

〔作者简介〕 李　志(1964—)，男，四川内江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李雪峰(1985—)，男，江西南昌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125)。

〔收稿日期〕 2015－12－02

〔修回日期〕 2015－12－28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社会制度的影响，从而可更全面地剖析文化消费的影响机制。从消费心理及文化来看，首先，我国民众一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俭以养德”的传统消费文化[13]，孔孟节俭以修养品德的思想影响了千百年来我国民众重储蓄、轻消费的习惯。其次，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伴随着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而养老难、看病贵、房价高、教育支出多等生活压力又大大增加了各项生活支出的不确定性，这种双重负面影响的结果就是，家庭的非必需消费品最大程度地被挤出，而收入则更多地被转为预防性储蓄，以抵消收支的不确定性给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14]。我国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正是这一心态的现实表现。由此可见，由生活压力导致的支出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动机，进而减少文化消费支出。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看，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探讨了社会保障的有无、社会保障缴费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15-17]，以及这种影响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存在的差异[18-19]。尽管研究结论还存在争议，但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存在显著的影响，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以推测，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和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以往采用社会保障某个单一客观指标的研究方法难以全面揭示其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结论往往也相互矛盾，社会保障满意度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居民对保障需求满足程度的整体评价，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果的最好方式。目前，关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较少，有学者阐述了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促进文化消费的作用[20]，但研究局限在理论层面，缺少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的文化消费主要来自城镇家庭，因此，分析城镇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对于扩大文化消费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的不同收入来源、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文化消费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　研究设计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不同收入来源对文化消费的影响

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传统经济学的收入假说理论无法提供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而解释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忽视了不同收入来源在消费决策心理上的影响差异。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会依据财富来源分别进行编码与归类[21]，即个体会有一个内隐的心理账户系统，不同账户系统的财富彼此不具有可替代性。该理论对消费领域的非理性决策行为进行了较好的解释，并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有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家庭的消费总支出[22-23]，且对不同消费内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24]。这一发现在不同地区都得到了证实[25]。心理账户理论在解释收入和消费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26]，大多数研究不仅证明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发现对于衣食住行等家庭基本生活开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最大。对不同收入来源与文化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发现，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带动效应最大[27]。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推测，城镇家庭不同收入来源均对文化消费产生正向影响，而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最大。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 城镇家庭的不同收入来源均显著正向影响文化消费;

H1b: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最大。

(2) 生活压力的调节作用

休闲限制理论认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是休闲限制的三大因素。其中，自身限制指个体的休闲偏好、休闲的态度与动机等，该因素对休闲的影响最大; 人际限制指与同伴、家庭成员等他人交互过程中的干预因素; 结构限制指资金、环境等客观因素[28-29]。文化消费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自然受到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的现状[2]表明，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日益丰富和多样化，文化消费已不像过去严重受到结构限制的约束。但文化消费没有出现预期的繁荣，暗示自身限制可能对文化消费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即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起到了主导作用。有研究表明，自身限制与家庭生活压力密切相关，在有限的收入水平条件下，如果生活压力越大，则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可能越高，这时家庭的总体消费就可能趋于保守，即倾向于主动抑制消费[30-31]。现代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城镇常见的生活压力如住房压力、教育压力、养老压力、医疗压力等，都会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32-38]。由于文化消费是“非必需”消费品，容易首当其冲地被压缩甚至被完全挤出[6]，所以，尽管具备了进行文化消费活动的经济条件，但由于自身限制因素的影响，文化消费仍然可能受到极大的制约。可以推测，生活压力大可能会形成文化消费的自身限制，进而降低人们的休闲动机，从而减少文化消费支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生活压力大时，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弱；

H2b：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生活压力大时，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弱；

H2c：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生活压力大时，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弱；

H2d：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生活压力大时，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弱。

（3）社会保障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进而选择不同的消费方式[39]。费尔德斯坦指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可以分为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而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的作用取决于两种效应之和[40]。有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15-16]，预防性储蓄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一作用机制。在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收入的不确定性外，其他风险来源比如健康风险、死亡风险等更可能是决定性因素，当人们面临此类风险较大时，可能导致储蓄动机增强而消费倾向降低[41]。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促进消费，原因是提高了人们抵御未来风险的保障感，从而改善了消费者对未来生活的心理预期，减少了消费顾虑[42]。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满意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居民对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主观感受[43]，显示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心理上的主观保障程度，对消费行为起到事实上的影响。只有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让人们有了较强的生活保障感，才能够起到提高消费信心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的国家，文化消费总量和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都比较大[44]。由此可以推测，在社会保障满意度高的情况下，尤其是养老风险和医疗风险降低时，可能会缓解生活压力对文化消费造成的负面影响，即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压力和收入可能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压力和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影响，当社会保障满意度低时，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社会保障满意度高时，生活压力不影响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

H3b：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压力和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影响。当社会保障满意度低时，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社会保障满意度高时，生活压力不影响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

H3c：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压力和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影响。当社会保障满意度低时，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社会保障满意度高时，生活压力不影响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

H3d：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压力和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影响。当社会保障满意度低时，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当社会保障满意度高时，生活压力不影响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和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了以下理论模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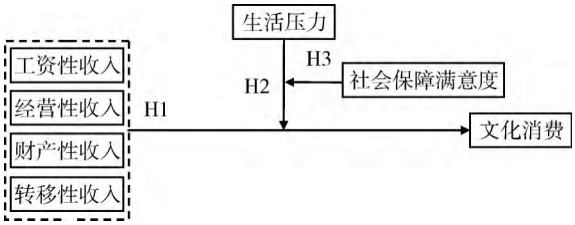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3 年 4 月至 10 月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该调查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通过 PPS 抽样的方法共入户访问了 10206 位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符合统计推论的要求。

以下是主要变量的涵义及其测量方式。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因变量为家庭人均文化消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费。本研究所指文化消费主要是家人进行娱乐休闲活动的各种费用，如看电影、看演出、旅游门票及旅游时的交通费用等。文化消费对应的调查是家庭文化、娱乐、旅游支出。用家庭文化消费除以家庭人数得到家庭人均文化消费。CSS2013 将教育和文化消费两项支出进行分离，从而得到了更加纯粹的文化消费数据。

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各项收入来源。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对应的调查为家庭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对应的调查为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家庭经商办厂收入。财产性收入对应的调查为家庭出租房屋、土地收入，家庭金融投资理财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应的调查为家庭成员退休金、养老保险金等社保收入，家庭成员医疗费用报销收入，政府、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的社会救助收入，政府提供的生产经营补贴、政策扶持收入，居委会、村委会提供的福利收入。

调节变量。本研究将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调节变量。生活压力对应的调查为在过去 12 个月中个人、家庭遇到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包括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子女管教困难，十分累心；家庭关系不和；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赡养老人负担过重；工作负担过重；家庭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遇到受骗、失窃、被抢劫等犯罪事件；投资失利或生意失败。社会保障满意度选取了当前对我国居民影响最大的两类保障，即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医疗保险满意度，对应的调查为用 1－10 分来表达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方面的满意程度，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基本社会保障满意度用养老保障满意度和医疗保障满意度得分之和表示。

控制变量。对消费行为来说，以往的消费惯性有很大的影响。根据布迪厄的文化消费理论，文化消费具有社会阶层差异，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偏好存在明显的区别[45]。因此，本研究将社会阶层作为控制变量。社会阶层对应的调查为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区所属的层次，本研究对该题项得分进行了顺向调整，即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依次计为 5－1 分。此外，根据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46]，因此，本研究将休闲娱乐满意度作为另一个控制变量。休闲娱乐满意度对应的调查为设定 1－10 分，依次表示非常不满意和非常满意。

三　统计结果分析

1. 数据预处理

为避免极端数值的影响，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首先，根据 2012 年全国各省市公布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最低值，即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为人均不低于 2940 元/年，以此为人均收入的下限，剔除了不符合条件的城镇样本 284 个。其次，剔除了城镇家庭人均收入超过 50 万元极端值的样本 4 个。再次，剔除访谈对象为已退休人员和在校学生样本 1285 个。最终得到了 4011 个有效样本。通过上述方法，控制了无效样本可能导致的统计误差，使其基本不会影响研究结论。

2. 描述性分析

在检验城镇家庭不同收入来源与文化消费的关系之前，首先对连续型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表 1)。由表 1 可见，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 0.8，可以初步判定变量之间不会出现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3. 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所提出的假设，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考察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不同来源收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 SD	1	2	3	4	5	6	7
1. 人均文化消费	531.54 ± 1914.51	1						
2. 人均工资性收入	14970.27 ± 17392.45	0.30**	1					
3. 人均经营性收入	4645.72 ± 19956.00	0.29**	－0.09**	1				
4. 人均财产性收入	613.89 ± 4896.44	0.13**	0.12**	0.06**	1			
5. 人均转移性收入	1363.94 ± 3900.01	0.08**	0.01	－0.02	0.01	1		
6. 社会保障满意度	12.62 ± 4.51	－0.02	－0.01	－0.01	－0.03	－0.01	1	
7. 生活压力	3.25 ± 2.27	－0.09**	－0.16**	－0.08**	－0.05**	0.01	－0.21**	1

注：** $P<0.01$，* $P<0.05$(双尾检验)，下同。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入和文化消费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对连续型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了中心化处理[47]，建立并回归方程。第一步，以文化消费为因变量，自变量中仅加入休闲娱乐满意度和社会阶层两个控制变量；第二步，加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和人均转移性收入等自变量以及调节变量——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第三步，加入各自变量分别与两个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第四步，加入各自变量和两个调节变量同时乘积的交互项，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各个模型的容忍度均大于 0.1，且都接近于 1，VIF 均小于 1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独立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表 2　　调节效应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标准 β	VIF	标准 β	VIF	标准 β	VIF	标准 β	VIF
控制变量								
休闲娱乐满意度	0.14**	1.10	0.09**	1.22	0.09**	1.23	0.09**	1.22
社会阶层	0.13**	1.10	0.04*	1.21	0.04*	1.23	0.03*	1.23
自变量								
人均工资收入(X_1)			0.34**	1.08	0.31**	1.81	0.33**	2.15
人均经营收入(X_2)			0.35**	1.05	0.42**	1.80	0.41**	1.86
人均财产收入(X_3)			0.07**	1.02	0.13**	6.53	0.13**	7.32
人均转移收入(X_4)			0.07**	1.01	0.07**	1.03	0.07**	1.10
调节变量								
生活压力(M)			0.01	1.23	0.02	1.21	0.02	1.34
保障满意度(U)			-0.03	1.10	-0.03	1.21	-0.02	1.27
交互项								
$X_1 * M$					-0.14**	1.45	-0.12**	1.67
$X_2 * M$					0.16**	1.77	0.15**	1.78
$X_3 * M$					0.02	2.81	0.01	3.17
$X_4 * M$					-0.02	1.13	-0.02	1.22
$X_1 * U$					0.06**	1.55	0.08**	1.73
$X_2 * U$					-0.21**	1.08	-0.18**	1.44
$X_3 * U$					0.08**	3.79	0.07	7.67
$X_4 * U$					-0.02	1.17	-0.02	1.19
$M * U$					0.01	1.09	0.02	1.18
$X_1 * M * U$							0.04*	1.31
$X_2 * M * U$							0.07**	1.46
$X_3 * M * U$							-0.01	3.65
$X_4 * M * U$							0.01	1.20
R^2	4.60%		26.82%		35.08%		35.45%	
Adjusted R^2	4.53%		26.60%		34.67%		34.95%	
F - value	65.01**		123.17**		85.20**		69.99**	

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呈现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文化消费的直接影响。可以看出，控制变量社会阶层（$\beta = 0.13$，$P < 0.01$）和休闲娱乐满意度（$\beta = 0.14$，$P < 0.01$）均显著正向影响文化消费，说明对这两个变量的控制是必要的。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家庭的不同收入来源对文化消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 $\beta = 0.34$，$P < 0.01$；经营性收入 $\beta = 0.35$，$P < 0.01$；财产性收入 $\beta = 0.07$，$P < 0.01$；转移性收入 $\beta = 0.07$，$P < 0.01$），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最大，H1a 和 H1b 得以验证。

模型 3 呈现了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城镇家庭工资性收入（$\beta = -0.14$，$P < 0.01$）对文化消费的关系，H2a 得以验证；但生活压力正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beta = 0.16$，$P < 0.01$）对文化消费的关系，且不影响财产性收入（$\beta = 0.02$，$P = 0.57$）、转移性收入（$\beta = -0.02$，$P = 0.26$）对文化消费的关系，H2b、H2c 和 H2d 未得到验证。社会保障满意度正向调节了工资性收入（$\beta = 0.06$，$P < 0.01$）、财产性收入（$\beta = 0.08$，$P < 0.05$）对文化消费的关系，负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beta = -0.21$，$P < 0.01$）对文化消费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关系，且不影响转移性收入（β = －0.02，P = 0.23）对文化消费的关系。

模型 4 的三重交互作用表明，社会保障满意度和生活压力共同调节了工资性收入（β = 0.04，P < 0.05）、经营性收入（β = 0.07，P < 0.01）对文化消费的关系，但不影响财产性收入（β = －0.01，P = 0.68）、转移性收入（β = 0.01，P = 0.80）对文化消费的关系，H3c 和 H3d 未被验证。为进一步验证 H3a 和 H3b，深入分析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具体调节效应，根据艾肯（Aiken）等的建议[48]，以高（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选择社会保障满意度高（低）、生活压力大（小）的家庭，得到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图 2、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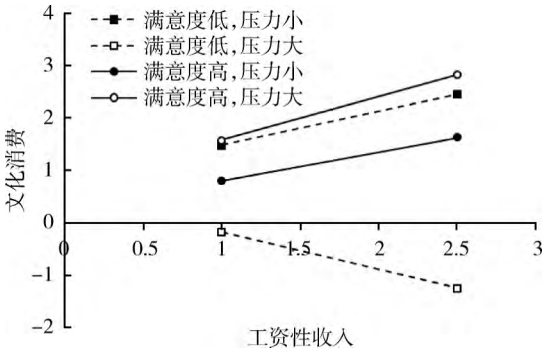

图 2　工资性收入、生活压力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文化消费的三重交互影响

图 2 中的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当社会保障满意度低（高）的时候，生活压力对工资性收入与文化消费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可以看出，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时，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工资性收入与文化消费间的关系，在生活压力较大时，工资性收入甚至对文化消费产生负向影响；但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时，生活压力不影响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这验证了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压力和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作用，说明生活压力对工资性收入与文化消费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会受到社会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只有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时，生活压力才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时，生活压力的调节效应不显著。H3a 得以验证。这一结果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相吻合，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乐观，由于不需要过多地将储蓄用于未来保障，因此，生活压力大并没有对消费信心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而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时，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保障不乐观，生活压力的增大会导致消费信心下降、储蓄动机上升，因此，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减弱。以上结果证实了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文化消费间接的正向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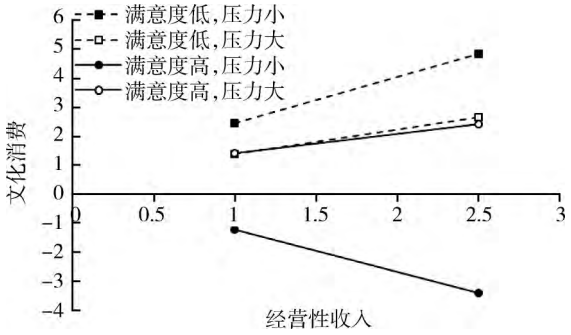

图 3　经营性收入、生活压力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文化消费的三重交互影响

图 3 表明了社会保障满意度、生活压力和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三重交互影响。由图 3 可见，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时，生活压力不影响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但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时，生活压力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生活压力较小时，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因此，H3a 部分得以验证。这一发现表明，城镇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并不符合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但却验证了心理账户理论，说明不同收入来源的确存在彼此独立的心理支出账户系统，而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否对文化消费有间接的促进作用还与收入来源密切相关。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可能是由经营性收入的用途特点所致。城镇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多来自经商办厂，当社会保障健全、生活压力较小时，由于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又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需要释放，此时经营性收入用于投资再生产的可能性更大，而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在减少，因而表现为对文化消费产生负向影响。总之，不同收入来源对文化消费的作用机制具有明显差异，生活压力调节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而调节的方向与社会保障满意度有关。

四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依据大样本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家庭不同收入来源、生活压力和基本社会保障满意度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文化消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压力负向调节了城镇家庭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对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文化消费间的关系则没有调节作用；社会保障满意度正向调节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但负向调节了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关系，对转移性收入与文化消费间的关系则没有调节作用；生活压力和社会保障满意度分别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三重交互作用；就工资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而言，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时，生活压力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时，生活压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经营性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则表现为，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时，生活压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当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时，生活压力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4011 cities in China,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come sources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ife stress and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salary incomes, operational incomes, property incomes and transfer incomes of urban household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s are salary incomes and operational incomes. Life stress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alary income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while i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operational income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alary incomes as well as property income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while it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operational income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Salary incomes and operational incomes, respectively, together with life stress and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have tripl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which reveals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mechanisms from different income sources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 cultural consum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参考文献

[1] 戴元光，邱宝林. 当代文化消费与先进文化发展［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

[2] 周易.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 3.66 万亿元缺口［N］. 中国青年报，2014－01－02

[3] Tak Wing Chan. Social statu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290

[4] Van Hek M，Kraaykamp G. Cultural consumption across countries：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highbrow culture in Europe［J］. Poetics，2013(4)：323－341

[5] 朱国林，范建勇，严燕. 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J］. 经济研究，2002(5)：72－80

[6] 王俊杰. 基于面板数据的河南农村文化消费地区差异研究［J］. 经济地理，2012(1)：37－40

[7] 高莉莉，顾江. 能力、习惯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J］. 软科学，2014(12)：23－26

[8] 王亚南，方彧. 中国东西部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异同探析［J］.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0(1)：65－76

[9] Torche F. Social statu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The case of reading in Chile［J］. Poetics，2007(2)：70－92

[10] Tak Wing Chan & John H. Goldthorp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Music in England［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7(1)：1－19

[11] Diniz S C，Machado A F. Analysis of the consumption of artistic－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in Brazil［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11(1)：1－18

[12] 厉以宁. 消费经济学［M］. 人民出版社，1984：119

[13] 姚郁卉. 俭德的传统诠释与时代内涵［J］. 伦理学研究，2012(4)：33－37

[14] 方福前，俞剑. 居民消费理论的演进与经验事实［J］. 经济学动态，2014(3)：11－34

[15] 方匡南，章紫艺. 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 统计研究，2013(3)：51－58

[16] 岳爱，杨矗，常芳等.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J］. 管理世界，2013(8)：101－108

[17] 白重恩，吴斌珍，金烨. 中国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2012(8)：48－71

[18] 甘犁，刘国恩，马双. 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0(1)：30－38

[19] 臧文斌等. 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2(7)：75－85

[20] 王亚南. 提升文化消费与健全社会保障［J］. 云南社会科学，2010(2)：86－90

[21] Kivetz R.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mental accounting and reason－based choice［J］. Marketing Letters，1999(3)：249－266

[22] 方福前，张艳丽. 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变动趋势分析［J］. 财贸经济，2011(4)：22－30

[23] 巩师恩，范从来. 中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的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 2002－2009 年省级面板数据［J］. 江苏社会科学，2012(1)：56－60

[24] 温涛，田纪华，王小华. 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3(3)：42－52

[25] 祁毓. 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2010(9)：45－56

[26] 李建军，张雯，王德祥. 心理账户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J］. 城市问题，2012(12)：73－78

[27] 吕寒，姜照君. 城镇居民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 2002－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61－66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8] Crawford D W, Godbey G. Reconceptualizing barriers to family leisure [J]. Leisure sciences, 1987(2): 119 – 127
[29] Crawford D W, Jackson E L, Godbey G.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leisure constraints [J]. Leisure sciences, 1991(4): 309 – 320
[30] 刘灵芝,潘瑶,王雅鹏. 不确定性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兼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实证检验 [J]. 农业技术经济,2012(12): 61 – 69
[31] 刘伟,胡宝娣. 社会保障支出、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效应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4): 49 – 55
[32] 李春风,刘建江,陈先意.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研究 [J]. 统计研究, 2014(12): 32 – 40
[33] 杜莉,潘春阳等. 房价上升促进还是抑制了居民消费——基于我国 172 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浙江社会科学,2010(8): 24 – 30
[34] 陈斌开,杨汝岱. 土地供给、住房价格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 [J]. 经济研究,2013(1): 110 – 122
[35] 田青,马健,高铁梅.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 [J]. 管理世界,2008 (7): 27 – 33
[36] 杨汝岱,陈斌开. 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 [J]. 经济研究,2009(8): 113 – 124
[37] 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 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 [J]. 经济研究, 2008(2): 119 – 131
[38] 邓翔,李锴. 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成因分析 [J]. 南开经济研究,2009(2): 42 – 57
[39] 黄少安,孙涛. 非正规制度、消费模式和代际交叠模型——东方文化信念中居民消费特征的理论分析 [J]. 经济研究,2005 (4): 57 – 65
[40] Feldstein M.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905 – 926
[41] Guiso L, Jappelli T, Terlizzese D. Earnings 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2 (2): 307 – 337
[42] 李翔,朱玉春. 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J]. 统计研究,2013(1): 76 – 78
[43] 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2 – 12
[44] 彭翊,李丽. 海外经验: 推动文化消费的三个路径 [N]. 中国文化报,2015 – 03 – 07
[45]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 – 613
[46] Hirschman A 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 – 176
[47]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 –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6): 1173
[48] Leona S. Aiken, Stephen G. West, Raymond R. Reno.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M]. Sage publications, 1991: 1 – 224

(责任编辑: 刘媛君)

(上接第 68 页)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multi – levelly and differently;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to guide labor – intensive industries which are friendly for environmental transforming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o boost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citi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o develop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Key words】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new urbanization; role and mechanism; realizing paths

参考文献

[1] 霍利斯·钱纳里(Chenery, H.),莫伊思·赛尔昆(Syrquin, M.). 发展的型式 1950 – 1970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2] 郭克莎. 三次产业增长因素及其变动特点分析 [J]. 经济研究, 1992(2): 51 – 61
[3] 江小涓. 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何德旭、姚战琪.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优化升级目标和政策措施 [J]. 中国工业经济,2008(5): 46 – 56
[5] 金碚,吕铁,李晓华.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几个问题的探讨 [J]. 经济学动态,2010(8): 14 – 21
[6] 沈正平. 优化产业结构与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互动机制及实现途径 [J]. 城市发展研究,2013(5): 70 – 75
[7]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 年) [C].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
[8] 黄勤,杨爽.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J]. 经济纵横,2014(1): 44 – 47
[9] 张车伟,蔡昉. 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5): 22 – 30
[10] 刘志彪. 推动基于城市化的产业转型升级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 07 – 20
[11] 刘志彪,于明超. 从 GVC 走向 NVC 长三角一体化与产业升级 [J]. 学海,2009(5): 59 – 67
[12] 李程骅. 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J]. 经济学动态,2012(4): 73 – 79
[13] 金碚. 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积极动向 [N]. 人民日报,2013 – 01 – 14
[14] 王一鸣. 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 [J]. 中国金融,2010 (4): 32 – 34
[15] 陈耀. 西部产业结构调整与承接产业转移 [J]. 中国科技产业,2010(9): 26 – 27

(责任编辑: 辛章平)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